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實踐獎

2020 年 4 月

一萬公里——台灣交換生看西班牙

陳奕寧

摘要

台灣學生在距離台灣一萬公里的陌生的地方——西班牙屬大加那利島——開啟新生活，遇到了許多文化衝擊，在生活中不斷修正自己對異地的認知，諸如打破對歐洲高等教育的印象與對種族的想像等等，但也見識到西班牙人對於權利爭取的態度，有許多台灣社會可以學習的地方。不在家鄉、不被熟悉的事物圍繞日常的時候，反而激發我去反思「我是誰」的探問，包括自己來自什麼樣的文化？我乘載的文化和其他國家有何異同？我的國家在國際的定位？處於全然不同的生活環境，一切不再理所當然，追尋自己成為一種必然。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陳奕寧（2020）一萬公里——台灣交換生看西班牙。國立臺北大學社會系《社會實踐獎報告》。

一、實踐動機

一直覺得台灣的學習氛圍缺少積極和自由，很難在與同學彼此想法的碰撞過程中得到啟發性的思考。因此一直很好奇歐洲高等教育的形式為何，總聽說歐洲社會自由開放，學生更能摸索出自己喜歡的事物，並且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也許能藉交換生的機會，認識對於學習和生活的不同態度。鮮少機會出國的我，想去看看世界的多元可能性，在陌生的地方以陌生人的姿態生活，地方與人兩者互為客體，舒適圈外的語言、文化、歷史、思維所可能帶來的衝撞和啟發，也是我決定往外走的初衷。想遇見不在預期裡的事物，想認識自我的微小與強大，想跟更多生命產生連結和共鳴，想知道自己能走得多遠、去到哪裡，自己所認定的極限是否有被突破的可能，如果能成功把框架往外推，那就可以繼續向外延伸，即使不知道哪裡會是終點。

二、實踐內容

在西班牙所屬之位於北非東側的大加那利島上的 Las Palmas University 進行一學期的交換，所屬的科系是 Modern Language，類似台灣的外文系，因此我在西班牙是上英語授課的課程，必要使用西班牙文的機會不多。課程部分我選修了英國文化歷史（Cultur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英語文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大眾文化研究（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授課內容是電影分析）和西班牙文。在島上大約生活了四個月，是我除了台灣之外居住最久的地方。在應付學校課程之外，也努力透過「社會學之眼」在生活中去觀察與理解這個比陌生還陌生的地方（畢竟是西班牙的「離島」）。

三、觀察與思考

(一) 初來乍到——二次社會化

其實當初完全沒有懷抱特別的期待或喜愛就選了西班牙的這間學校（我是看科系選的），甚至在交換生分發結果出爐後，我搜尋了這間學校的位置，才赫然發現原來西班牙有離島，我心心念念要去歐洲，沒想到要去的地方在地理上來說屬於非洲。這是歐洲在我心中的第一次「破滅」，我們口中的歐洲，或者我想像中的歐洲，究竟指涉的是那塊西起英國、北至冰島、東到烏克蘭的「歐洲大陸」，亦或是共享某些世界觀、生活方式或宗教信仰的「文化上的歐洲」？

過往生活的經驗大概都派不上用場，甚至可能成為適應新生活的阻礙，當想將過去的方式在新的脈絡中使用卻碰壁時，才發現以為的理所當然是行不通的。人擁有一切常識、知識、行為、認知皆是從觀察開始進而模仿，在舒適圈已久的我很久未經歷彷彿初生嬰兒認識世界般的嶄新與無知。

於是我開始花費大量的時間觀察，看看街上的人，如何「像個西班牙人般」的買菜、吃飯、在露天咖啡廳聊天，我也曾經不止一次站在超市裡，可能是榨汁機旁邊、標籤機一側或巧克力架對面，等待其他當地人替我「示範」這些東西該如何操作。在觀察出訣竅後，我就能跳過在機台前面摸索或拿出手機google翻譯的尷尬過程，反而是能以「這個東西在我掌控範圍」的姿態去使用。

其實一切在初始時並沒有那麼坦然順利，剛到的第二天我因為不曉得買水果的規則而被其他客人白眼，也曾在聚會時因羞於主動和他人攀談而尷尬收場，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的挫折曾令我封閉了一小段時間。後來發現觀察是件重要的事，能使人對新環境裡的事物有所掌握，雖然不可能是全部，但至少能有輪廓性的藍本。所謂「把感官打開」不是紙上談兵或空話，是真正學著轉移注意力、真正去抓住某些原本會被大腦的篩子自動過濾掉的小事。

在人際關係方面我也獲得新的思維。台灣的社會相對來說還是封閉，人和

人之間的距離必須拿捏好，我們基本上不太會主動去開啟和陌生人的交流，「搭訕」是一件很奇怪、令人懷疑是否心懷不軌的事。然而我在西班牙發現不同的文化，他們開朗熱情，很愛講話，肢體語言和表情都相當豐富。公車上的鄰座、店員和客人之間、初次見面的朋友，原來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可以這麼自然，以前的我太多包袱，而這樣的氛圍改變了我許多，從一個在社交場合會感到極度不自在的人，變得能自然的和初次見面的朋友聊聊對方、聊聊自己，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收穫，也使我開始思考過往自己所設定的距離感，與社會氛圍下的矜持與保留，是否導致我錯失許多交流的機會？

新的邏輯系統會覆寫，必須採用另一種方式進行思考，令人緊張興奮的不只是學習新事物，更是知道這些所謂的新，不會只在單一面向，而是幾乎所有日常裡，取代曾經賴以為生的過去。小心翼翼的讓自己在所處的社會裡不至於突兀，同時不顧一切的拓展曾為自己畫下的界線，多層次的並進與拿捏，二次社會化的體驗令人著實著迷。

（二）西班牙的高等教育——師生素質、課程內容、價值觀

當我知道西班牙大學的課程安排不像台灣在很大程度上學生可以依自己偏好選擇課程，反而是像台灣的國民教育，一個班的學生會一起修所有大一到大四的課程時，才知道我以為普天下大學生都享有的「自由」，原來並非理應如此。我所在的 Las Palmas 大學是加那利群島的主要大學之一，因此也會有來自其他島嶼的學生，當然國際生也非常多。分數評量上，依然以傳統期末考試的方式作為主要評量標準，其餘大概只有 10%是出席分數。

課程裡十分重視討論和合作，有的老師幾乎每堂課都會要求課堂分組討論或完成課堂作業。相較於台灣，西班牙學生不太會在課堂上使用手機，因為如此整體來說這裡的學生也較專注於課堂上，筆記做得很勤勞。但有一點和台灣相似，在課堂中願意表達自己想法的學生總是固定是某幾個學生，大部分的同

學依然是沉默的，不太會積極發言，和我原本以為的每個學生都勇於發表看法的情況不太一樣。

我選修了三門課，英國文化歷史、英語文學導論與大眾文化研究，分別是大一、大二和大四的課程。再一次出乎意料的，這些課程不論在內容上或深度上都僅像台灣的通識課程，而不是專業「知識」。課程內容上的多元性是另一項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例如在英語文學課上，指定閱讀除了歐美經典小說，也包括使用英語寫作的非洲作家、墨西哥裔的美籍詩人，或其他涵蓋種族或性別議題的文本。「英語」在課堂上不是代表歐美社會文化背後的單一視角，而是做為媒介、語言工具，讓創作者和讀者能在同個水平上表達與理解不同的文化和觀點。

另一件令我訝異的事是，每當老師在課堂上提到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都用一種「的確如此」的篤定態度在說，而且彷彿不必對內涵多做闡述，同學也本來就理解這些不平等就是這麼存在著。我不是讀社科院更不是社學系，所以我相信這些概念在學生腦中深植的現象並不是來自同溫層的共同價值觀，而是大學以前的國民教育。

有次一到學校發現校門口擠滿了人，舉著各種抗議標語，才知道原來那天學生發動罷課，抗議師資不足、設備缺乏及想出國的交換生無法獲得任何金錢補助，原本滿座的教室空盪盪，包括狀況外的我只剩下三四個人，其他學生都響應罷課，老師也貼心的沒有上正課。整個校區都屬於外文學院，不是「激進的」社科院，發動罷課就能獲得這麼大的迴響，相較於在台灣、在北大，只要有人為公共議題發聲就被酸為「社科院覺青」、「社會亂源」，我簡直無法想像北大各個系所的人共同為自己的教育權益站出來的景象，更不用說其它層次更高的社會議題。但在這裡，這樣的事卻真實發生了，震撼的感受非常巨大。

假如今天只是發動「抗議」，我應該不會那麼震撼，即使是少數人也能抗議，就像台灣總是還會有少數人發聲。但罷課的層次完全不同，如果一個班只

有五個人罷課，實際效果與翹課別無二致，不論罷課或罷工都需要獲得多數人對於理念的認同才有意義，行動的團結才有可能產生具體影響力，而「積極拒絕」做原本應該要做的事不僅需要勇氣，也充滿各種機會成本的考量，所以更加佩服西班牙年輕人對於捍衛自己權益的認知及行動力。

我曾經和西班牙同學討論過台灣空服員罷工，卻被社會大眾視為貪婪、自私的一群人。他對於台灣對待罷工行動的不友善感到訝異，但也跟我說了一段話：“ If the people don't complain for their own country, no one else will! In Spain there are also many people who don't care, but thankfully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ho do.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do because we know our future depends on the world we're creating and changing right now.”

台灣人很少意識到「不平等」和「爭權」是兩件相輔相成的事，亦很少去檢視既得利益者的位置及社會資源的失衡配置，導致問題的根源始終難以被真正認明，爭取權益的弱勢族群反而會被貼上更多負面標籤。看到國外的例子，再對比於國內的社會氛圍，令我深刻感受到在高中、國中甚至小學去和學生談論議題、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是一件相當重要（同時也艱難）的工作。

（三）世界第三大語言——語言裡的性別和限制

以我自己是零基礎來說，西文入門不難，畢竟基本上都是 26 個字母組成的語言，有英文底子的話一些語言邏輯是可以互相援引的。而且西文的字母都是固定的發音，不像英文不同情況有不同發音，所以就算是不認識的單字，只要知道怎麼唸就一定拼得出來，可以隨時查字典。

西文和英文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陰陽性，不論形容詞、名詞、冠詞都有分陰陽，是個非常講究性別區隔的語言。在學西文前，我很難想像桌子和郵票被歸類為陰性，電腦和地圖屬於陽性，甚至連形容人很高也會依被形容對象的性別區分為陰性的很高和陽性的很高。我不知道是在什麼背景下西文發展出這個特

性，也無從得知這樣的語言脈絡對西文使用者的思維有什麼影響，但可以觀察到當語言區分出陰陽時，與現實生活別無二致的是，陰和陽之間的主控權依然屬於後者。

例如，西文的他們是 ellos，她們則是 ellas，但當即使遇到「9999 個女生+1 個男生」所組成的一群人，就必須用 ellos 稱呼。也就是不管比例如何，只要群體裡有一個以上的男人，整群人就用男人的用法統稱，類似的例子多如牛毛，但邏輯基本上皆以這個方式運作。

雖然學期中也繼續進修西班牙文，但西文課的班上同學多為來自歐洲其他國家的交換學生，歐陸語系之間的親近讓老師即使快速進行課程，他們也能學習順利，然而在短時間內要吸收大量的單字、陌生的文法邏輯和多變的時態對來自完全不同文字系統的我來說卻很困難，因此西文程度非但沒有進步，反而讓我有點膽怯以西文和他人交談。

語言隔閡衍生的問題比想像中來得多，在我無法讓自己的西文更精進、另一方面也不可能要求當地人英文變好的情況下，我勢必要面臨生活中的種種限制，並學著接受它們。這些問題諸如難以建立較深度的人際關係、到公私部門處理事務時的語言不通到在餐廳裡讀不懂菜單。日常購物的場合裡我還是會盡量使用西文，買東西前總是在排隊的人龍裡，心中反覆誦唸和演練等會要說出口的西文句子，即使待了幾個月，每每在超市跟店員說「我要 600 克的豬肉」前，都要再鼓起勇氣一次。

生活的框架因語言浮現得明顯，向外伸展的動作太大或試圖進行新嘗試時，心裡想去到某處但語言表達及理解的落差往往或使事情事倍功半，或為避免時常的碰壁和折返而情願選擇在已知能掌握的範圍裡，依照習慣生活。因為如此，交換生生活的後半段中，我的生活不再像剛來到的那幾個月面對未知的探索和溝通失敗的後果，而是在已摸索出的的範疇裡建立規律性的生活。所謂生活裡的規律性和侷限，舉例來說，我知道買咖哩要從住處要搭六站公車到中

國商店，但不知道除了那裡以外還有何處能買到咖哩，所以每次想買咖哩，我就固定搭六站的公車。大概是這種感覺。

(四)「離」島——族群多元與少數族群

以地理位置來看，直覺的想加那利群島應該是屬於某個北非國家，而不是遠在一千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座落在歐美非三塊大陸的交通航道中間，作為在漫長的征服和殖民歷史中成為西班牙一部分的海上群島，這裡的族群非常多元，當地人中甚至有個說法「這裡每個家庭中一定有外國人」。

我的室友之一是中國裔西班牙人，雖然外表是典型的華人臉孔，但從小就隨父母移民到西班牙，不論在文化認同或國家認同上都是西班牙，她所有行為舉止和生活習慣都是西班牙式的，除了臉孔和膚色，身上沒有中國文化的色彩。我當地的同學裡也有古巴第二代、摩洛哥移民、義大利人等等，外表完全沒辦法當作認識一個人的判準。

不要用眼睛去評斷事情是我來到這裡所學習到的第一課，以外貌去決定該把某個人歸放在文化座標系統的何處，不僅無禮，也狹隘。儘管不同種族擁有相異的樣貌和膚色，外表和族群的連結亦是與生俱來，並且也因此或多或少承襲來自種族的價值觀和習慣；然而在這個小島上我看到的是，成長和生活的國家的文化對人的影響，大過於膚淺的只從種族去判斷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即使島上族群比其他國家多元許多，但亞洲人的比例相較其他地區卻更稀少。初到時，走在路上總有種「跟自己相同的人的人好少」的孤獨感。後來慢慢認識其他來自韓國的交換生，他們也變成我在島上少數會相約玩樂、偶爾分享生活的朋友。

文化親近性的起源究竟來自哪裡？當我想著「跟自己相同的人的人好少」時，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似乎也被我當成和自己同類的人。這些陌生又熟悉的鄰國，當我身處於更迥然不同的遠方時，卻因為更巨大更概括的相似文

化，而被認知為比其他地區的人和我更相近、溝通和相處上能更無礙。如果這些感受並非我的錯覺，因為歷史和地緣關係，在認同上屬於不同的民族的我們，的確共享著許多形式的文化、價值與信仰。

距離塑造出文化的相對距離感。當彼此都在離家二十幾個小時飛行的地方時，區分他我的界線會位移，我們視家鄉一樣遙遠、飲食習慣、生長環境和價值觀類似（相較於歐洲人）的彼此為「跟我一樣的人」，即使回到母國後，這樣的親近感很難再次於日常中出現。

另一方面，剛到歐洲的前兩三周，我心中總懷抱著「亞洲人自卑」。這個自卑感並非源於認為自己比不上歐洲人，而是擔心歐洲人因為種族歧視認為我不好，但這樣的情況就在我和越來越多當地人相處後放下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yellow fever」，也就是對亞洲人的熱愛。我在外文系修課（這間學校的外文系學生必須學習法文和中文），系上有許多本來就喜愛亞洲文化的同學，因此會對我特別熱情和友好。對於作為交換生的我來說，這個現象能讓我認識更多當地朋友，並不是件壞事，但不禁會思考，相較於亞洲國家對白人的特殊喜愛，兩者之間的來源有何異同？

不論是在亞洲或歐美的社會情境，另一種族的比例都極少，物以稀為貴的心理作用使得少數族群更能引起他人的好奇心。愛慕白人的 white fever 源於種族主義下的白人優越和自我貶抑，種族主義透過美化和隱匿的西方視角的媒體植入人心，弱勢族群缺乏自我認同，反而相信白人的世界更為優秀。而 Yellow fever 則另當別論。相較於亞洲能接收到許多強勢的歐美文化傳播，歐美媒體上關於亞洲人的形象，往往是由他們的視角甚至是刻板印象型塑的，而非來自於直接的亞洲電視節目或電影。我認為 yellow fever 有幾個原因，其一是對黃種人過度浪漫化的想像，另外有些則像「獵奇」的心態，因不了解與稀少性而更想認識。

（五）來自哪裡？——歸屬感與再認同

英國文化歷史的課堂裡，有次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老師便請班上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上台分享，從不同的歷史視角出發，在二戰當中經歷了什麼。二戰對台灣來說可以說是命運的轉捩點，脫離日本的殖民，回歸「母國」統治，後又因國共內戰和國民黨退守，長達 38 年的戒嚴和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使中華民國/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到今天依然難以達成社會共識。

那天我上台解釋這段歷史，並說明 Republic of China、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和 Taiwan 之間的關係。三者間複雜的歷史因素和牽涉面向廣大的認同問題，一時半刻間也很難讓台下的西班牙同學們完全了解，但他們一直以來都很尊重我的國家認同，從來不會把我當成中國人。雖然因為他們是學中文的，不少人會在自己的社群軟體頁面上放上中國國旗的圖案，讓我每次看到心中都感到很複雜。五星旗對他們來說只是想表達自己學習中文、喜歡中華文化，還是他們全然不知這面旗幟背後所代表的政權，其專制和腐敗？

儘管如此，在一次次與來自不同國家背景的人說自己來自台灣，一次次解釋台灣不屬於中國，或遇到有人本來就知道台灣和中國的差別時，當認同不只是放在心裡，而是化為話語變成一種信念，總覺得對台灣的認同在這些過程裡又更緊密，更清楚自己的根源，以及她與眾不同之處。

因為自己也親身經歷了在外闖蕩的過程，對於在異鄉生活的人都有了切身的感同身受，儘管每個人離鄉背井的原因和型態不盡相同，但在精神層次上，對此地的疏離和家鄉的眷念皆非隨著時間可以完全消除的，也許會越來越淡，但我相信不會消失。以前我不懂何為鄉土之情，日復一日同樣的陽光同樣的景象好似稀鬆平常、理所當然，但當不在家卻發現心繫著家，家的方向才更清晰，原來靈魂會知道自己來自哪裡，不論飲食、思維、語言都是根深蒂固在腦中最深層之處，這些瑣碎無聊的平常，才是構成一個「人」的基本元素。

從小在這片土地上生長，讓人身在其中時不自覺地失去了以欣賞的眼光去

觀看周遭事物的距離。離開，才知道出發的地方有多好，出國前從不認為自己會想家，果然還是太鐵齒了。每天大概會打開手機的世界時鐘三四次，一打開就是台灣時間，想想台灣的人們正在做什麼，想念讓短短的六個月變得好長。離家最遙遠的時候，就是離家最近的時候，所以不必害怕遠行，其實正走在回去的路上。

(六)後記

第一次經過離租屋處四個街區的街道時，只想說怎麼有這麼多人坐在門口，後來從性別和穿著打扮才慢慢推敲出來，原來這條街是性工作者聚集的地方。因為是去超市採購必經的路，所以後來常常經過這條街，發現這些女生各種膚色都有，沒客人時就坐在門口互相聊天、滑手機，或者扶在窗台看著街道，有人經過時會抬頭看一眼。如果把人物抽離，其實就是再普通不過的街道，就在一般靠近大學的住宅一樓，沒有特別遮掩，也沒有特別混亂，才讓我在偶然撞見時渾然不知。

在台灣時曾在因為好奇，在朋友帶領下去過私娼寮。在此之前不只不曾想過會接觸到這樣的地方，甚至這樣的場景都不存在於我對社會的想像中。來往的車輛、物色的雙眼、粉紅色昏暗光線、每扇門後微笑點頭的女人們。城市背後被隱形的另一個世界，到那時也算略為窺見。彷彿另一個世界般的隱蔽和躲藏，牽涉到法律界限及社會對性工作的看法，然而對比於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坦然，還是不禁台灣替只能活在黑暗裡的性工作者感到悲哀。

後來結束兩個月的旅行再次回到小島上時，竟有種熟悉的感覺，精確一點的說，是能掌控的事情更多，旅行期間時刻伴隨的不確定感在這裡可以放下。半年前才初次指著地圖認識的地球另一端的小島，竟然成為除了家鄉以外居住最久的地方。

學期間在島上的生活很單純，單純得充滿規律，因此不論情感或生活上其

實依然和這個地方感到疏離，時不時會產生距離感。但畢竟是生活了半年的地方呀，雖然時常往返相同的路，都光顧一樣的店，但隨著時間依然積累出習慣，像是去超市能夠走一圈就拿好所有待購物品的順利，這樣的順利無非建立於熟悉，而熟悉是時間的產出。

回台班機起飛時心中想起了中國民謠歌手宋冬也〈鴿子〉裡的歌詞：「讓我再看你一遍從南到北」。想起半年前的初次見面，八月二十六日，天氣晴朗，一如這個島有別於歐洲大陸的終年陽光普照，拉著兩個行李箱風塵僕僕，在機場甚至就能看見大海和棕櫚樹。我以為時間是很漫長的，但其實離開眨眼就在眼前，而記憶都還那麼鮮明。那些來來去去的日子，收留我的地址在這裡。